

像抓粮食一样抓畜牧业

三农瞭望

当前，畜牧领域有两件大事引人关注。一是国家推动运猪转向运肉，二是增强牛羊肉供给能力。经国务院同意，自5月1日起，全国划为5个大区实施分区防控。除种猪、仔猪等外，其他生猪不向大区外调运，即运猪转向运肉。此外，农业农村部发布《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未来牛羊肉供给能力将得到提升。这两件事表明，要从重要农产品保障的高度、农牧结合的角度、种养循环的深度，来思考如何推动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民以食为天，食饭也食肉，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畜牧业是农村改革的先行领域，较早实现了市场化。如今，我国多数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主要畜禽规模化养殖率比2000年提高了30多个百分点，畜牧业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占比约一半，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在上升。畜牧业已从乡村家庭副业成为农业支柱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畜牧业保供难度明显加大。与粮食连年丰收、价格稳定

民以食为天，食饭也食肉，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像抓粮食一样抓畜牧业，并不意味着要套用推动粮食生产的手段来推动肉蛋奶生产，而是要提高重视度；并不是说要攀比政策扶持力度，而是说要从食物安全的角度正视其地位。

不同，畜牧业年度产量差异较大，价格周期波动明显。2014年，生猪价格振荡下降，鸡蛋价格跌至低点，家禽业严重亏损。2020年，多数畜产品已是不同光景。近年来，猪禽生产的阶段性过剩和阶段性紧缺交替，一旦供应紧张、价格上涨，社会反应就很强烈。这说明，抓好畜产品供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何避免生产大起大落，亟待从发展机制上寻求突破。

同时，廉价畜产品进口冲击日益严重，牛羊肉、乳品、猪肉等进口量都在增长。这是畜产品竞争力不强，国内外价格倒挂所致。竞争力不强突出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畜禽生产力、饲料转化率不高。以生猪为例，我国年场均出栏仅几十头，而美国年场均出栏约1700头。我国每头母猪可提供出栏肥猪15头，而

养猪强国丹麦可达22头至26头。

目前，我国人均动物蛋白日摄入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奶类占有量不到世界的1/3、亚洲的一半；肉牛肉羊养殖方式落后，牛羊肉供求矛盾突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预计今后5年，我国每年还有80万吨肉类、100万吨奶类的消费增量。尽快提升畜牧业发展水平，已成当务之急。

纵观全球，凡是农业发达的国家，畜牧业大多也很发达。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小，种植业受规模限制突出。人们常说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国草原面积有55亿亩，占国土面积的2/5，是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对而言，畜牧业资金密集度更高，技术集约化优势更明显，在经营规模上更容易突

破。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畜牧业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

从历史看，我国自古偏重种植业，畜牧业一直是辅助部门，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而欧洲一直重视畜牧业，13世纪时畜牧业和种植业就已平分秋色。从地理看，打开地图，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是典型的农牧分界线，这条线往东往南是主要的农区，往西往北则是主要的牧区。从大农业的结构上看，粮经饲结构不合理，种养比例不协调，农牧结构不科学，制约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像抓粮食一样抓畜牧业，并不意味着要套用推动粮食生产的手段来推动肉蛋奶生产，而是要提高重视度；并不是说要攀比政策扶持力度，而是说要从食物安全的角度正视其地位。畜牧业和种植业不一样，有关部门要转变以往“抓产业就是抓产量”的思路，多在体制机制上寻突破，多在质量效益上下功夫，多从整个国土资源上做文章，下好畜牧业与种植业的融合发展棋。唯有如此，才能跳出畜牧业来发展畜牧，形成我们的比较优势。

齐金亮

莫把地方金融机构当“提款机”

彭江

加强地方金融机构微观治理和金融监管

地方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一直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切。日前举行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提出：“完善法治，增强活力。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纠正不当干预行为，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激发地方金融机构的创造创新活力。”

当前，我国已形成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大中小微型银行合理分工的多层次银行金融体系。地方金融机构与大型银行分工不同。作为金融体系的“毛细血管”，地方金融机构在服务“三农”、基层、中小微企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体来说，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势头良好，但近年来也出现部分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暴露事件。这些风险事件的背后，或多或少与有关地方政府不当干预金融机构指令放款、大股东操控地方金融机构甚至将其当作“提款机”等不当行为有关。

地方金融机构持续健康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一旦风险暴露，产生的影响并非仅在单个金融机构内部，还有可能向金融同业链式传导、向实体经济扩散传导。金融行业有其自身特点和管理规则，无论是政府还是大股东都需要遵守相应规则，应从法律层面对维护金融行业稳定发展的规则予以保护，对破坏规则者以法律制裁，让金融行业参与者守规、敬法。

实践中，地方金融机构大多体量较小，所从事的金融业务定位于满足基层区域融资需求，“小牛拉不动大车”，更经不起折腾。某村镇银行的行长曾对笔者说，“小”银行对每位企业客户发放的贷款金额相对较小，一旦企业客户下一步发展壮大，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我们会建议它联系大中型银行。这家银行的经营理念与定位是恰当的。在这样的操作下，放贷业务稳健，业务风险可控。可如果遇到地方政府不当干预，要求这样的“小”银行改变其自身的定位，为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产业大举放款，把“小”银行当作“提款机”，毫无疑问会给银行带来风险隐患。

更为重要的是，从宏观层面看，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会扭曲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致使资金的配置脱离了市场经济规律，流入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的领域，诱发金融风险。

为减少地方政府不当干预金融机构行为，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曾印发修订后的《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激励措施的实施办法（2020）》，其中指出，各地方政府不当干预金融机构正常经营管理情况，将纳入定性评价标准。

地方金融机构在坚守定位，专注主业，立足本地，回归本源，服务当地、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时，同样需要拥有良性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地方金融机构不是政府和控股股东的“提款机”，需要用法治护航，为地方金融机构的创造创新活力提供制度保障。

（本系列评论结束）



徐 骏作(新华社发)

向恶意商标注册说不

一段时间以来，“傍名牌”“蹭热点”“不用先囤”等恶意商标注册行为时有发生，引发广泛关注。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累计驳回恶意抢注和囤积商标注册申请超15万件。企业恶意注册商标，无非是为了占用资源、待价而沽。但是，这种行为不仅扰乱商标注册管理秩序，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也不利于企业开拓市场，打造自身品牌价值。对此，相关部门应不断完善商标法律制度，加大遏制和处罚力度，及时曝光典型案例，以更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时 锋）

非理性“打榜”值得警惕

秦朝森 潘胤竹

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数字音乐领域有个怪象：同一个用户重复花钱购买同一个作品，重复频率从数十次到数十万次不等，也就是说，如果花2元钱可以购买并听一首歌的话，有的消费者在一首歌上花了几十万元。在重复购买的人群中，粉丝占大多数，他们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购买来提高偶像的作品销量，也就是所谓的“打榜”。

虽说这种现象是平台和粉丝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年轻群体在消费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非理性行为也值得警惕。

年轻群体究竟为何会出现以上非理性消费行为呢？首先，年轻人喜欢追求新鲜事物，对于各种潮流文化的接受程度也相对较高，他们愿意为爱好投入、“为爱发电”。其次，年轻人在消费过程中容易出现攀比心理，一些年轻人试图通过消费来标榜自己的存在，获得别人的关注，却忽视了自己的实际承受能力。第三，类似于音乐App等商家的

营销套路容易助推青年人的非理性消费。

年轻人有消费能力，也有消费欲望，其合理消费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大部分年轻人甚至学生尚未建立起成熟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很容易被诱导营销影响，节衣缩食乃至通过网络借贷声援“爱豆”。一旦消费超出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会引发财产损失和身心损害等社会问题。因此，应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种非理性消费行为。

平台类企业应更好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完善对各种粉圈“集资”行为的审核，做到不利用粉丝追星心理和“打榜”心态诱导非理性消费。市场监管部门应提高监管力度，加强行业规范，为消费者提供健康有序的互联网消费氛围。相关部门、学校和家庭应加强对青少年消费观的培育，学校应重视开设金融、消费等课程，培养学生们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理性为自己的爱好消费。

环保利剑高悬 岂容藏污纳垢

陈发明

是要在压减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做好提质增效升级的文章，将产业做精做强做绿。钢铁、煤炭、建材等产业，虽然是传统的排放大户、耗能大户，但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做好工艺创新、产品创新、链条创新，执行严格的环保标准，从而实现从规模型增长、粗放式增长转向绿色增长、高质量增长。

另一张网是“利益保护网”，捆住了手脚。环保问题在很多地方之所以久拖不决、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背后有个别干部与不法企业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链，甚至甘于被违法排污企业围猎，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面对违法行为不仅不较真碰硬，还当起了这些企业的保护伞。也有个别企业，要弄暗中伤人的伎俩，对执法干部诬告、造谣，致使一些基层执法者产生顾虑，对恶势力望而生怯。不过，环保利剑高悬之下，容不得暗通款曲的勾连和藏污纳垢的保护，更不能放任个别

需要指出的是，对传统产业“去产能”，而不是“去产业”，并非是要把这些产业“一棒子打死”，而

今年以来，铁矿石价格持续上涨，国内大商所铁矿石期货价格已经处于该品种上市以来的历史高位，新加坡铁矿石主力合约价格也在近期创下历史新高。中国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供给侧寡头结构和全球流动性泛滥的背景下，要警惕上游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侵蚀经济复苏的成果。

本轮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始于去年二季度，至今涨幅已经超过100%。本轮上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中国快速复工复产及全球订单回流带来的制造业需求驱动。从数据上看，我国PMI指数从去年2月份触底后迅速反弹，并保持在扩张区间。与之相对应，宏观经济在去年一季度触底后，后面三个季度环比持续回升，同比增速也在不断提高，这个阶段持续到去年四季度末，最终以2.3%的全年经济增速领先全球经济复苏水平，也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第二阶段是从去年底开始，主要是由各国疫苗大规模接种带来的全球经济复苏，进而形成需求共振拉动。

从去年二季度开始，在应对疫情、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很多国家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助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根据国际结算银行的数据，2020年三季度末，全球宏观杠杆率达277.7%，较2020年初抬升33个百分点，为2000年以来的年度最高增幅。国际金协协会的数据显示，2020年约有3130亿美元流入新兴市场国家，今年初美国又祭出了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大量流动性释放之下，全球大宗商品经历了一轮明显上涨行情。作为重要的工业原料，当前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和波动性特点也呈现出了明显的货币金融特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需求方和进口国。一方面，我国粗钢产量超过全球50%，对铁矿石的需求量超过全球一半；另一方面，我国冶炼所需的80%以上的铁矿石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但是，在国际铁矿石市场供给侧的四大矿山寡头格局下，我们并没有获得与需求规模相对应的定价权。往产业链下游看，我国制造业仍然处在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的转型升级过程中，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与需求侧的议价能力不够强。

铁矿石价格的快速大幅上涨给下游产业带来多方面影响。一是大幅抬高了钢铁产业的生产成本，因为铁矿石成本占到了钢铁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二是成本的上涨会沿着产业链向下游传导，去年四季度以来家电产品普遍提价就与这种成本传导密切相关；三是从全产业链角度看，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在抬高下游制造业成本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侵蚀了本轮经济复苏过程中实体经济的利润。金融资本通过期货、掉期等金融化的定价机制抬高铁矿石价格，实际是通过价格杠杆转移利润，让国内实体经济补贴海外矿山和金融资本。

总之，我国经济复苏成果来之不易。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面临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多方面重任，应当多措并举平抑铁矿石等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一是应进一步加强铁矿石市场的信息披露，稳定市场预期；二是帮助实体企业通过套期保值等方法对冲成本上涨；三是持续推进钢铁行业整合，提高行业集中度和原料定价话语权；四要引导资本向制造业流动，加大金融扶持实体经济力度，严厉打击国内外金融资本对铁矿石的炒作。

（作者系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洞见